

# “不正常”政体的存续

——比较政治视野下中国政体活力研究五十年

李振

**内容摘要：**西方学界对中国政体存续问题的讨论，源于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政体的分析，它们大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的政体是与西方政体不同的“不正常”政体。194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共产主义制度及中国现有政体存续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模式：趋同论、极权主义、新传统主义、崩溃论和延续论。这些不同模式的前提假设、理论主张异中有同，也各有其局限性。19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苏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也进行了很多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建构离不开具体环境，成功的制度转型离不开有效的政府。中国现有政体正在多个维度发生变化，未来的转型方向清晰与否，这部分地取决于不同政体之间能否“存而不同”。

从共产主义制度出现的那天起，就以两个明显不同于西方政体的特征——列宁式的政党组织和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sup>1</sup>——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在西方世界的人们看来，只有那些存在竞争性选举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政体才是“正常的”。他们不禁要问：共产主义制度是否会长期存在，它是否能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呢<sup>2</sup>？及至1940年代初期，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各种出版物，包括著作、期刊先后问世；<sup>3</sup>学者们相继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式。1949年后的中国自然也

---

· 李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Email: lizhencqu@gmail.com。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富有洞见的点拨；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欧树军博士的建议。文责自负。

<sup>1</sup> Andrew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23 *Theory and Society* 299(1994).

<sup>2</sup> 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载《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129页。

<sup>3</sup> 例如1949年创刊的《苏维埃研究》（*Soviet Studies*）（于1993年更名为《欧亚研究》（*Europe-Asia Studies*））、1952年创刊的《共产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于1994年更名为《后共产主义的问题》（*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1960年创刊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968年创刊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1993年更名为《共产主义与后共产主义研究》（*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以及1970年创刊的《澳中》（*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后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等。

被纳入研究议程。何汉里 (Harding, Harry) 将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追溯到了 1950 年代末。<sup>4</sup> 苏东剧变后, 相关讨论并未销声匿迹, 只是将目光集中于中国等几个保留 (或部分保留) 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

本文将中国现有政体放在历史比较的分析视野下, 通过评述西方学术界 (以美国为主,<sup>5</sup> 也包括部分其它地区的学者) 研究共产主义制度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政体存续 (Survival) 问题的各种理论模式, 讨论如何分析和研究中国现有的政体<sup>6</sup>。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概述自 1940 年代以来, 学者们对共产主义制度及中国现有政体存续问题的五种模式或预测; 第二部分从前提假设、理论主张及论证等角度集中评述各种模式或预测的局限性, 并讨论学者们在 1990 年代之后对苏东地区政治转型的相关反思。第三部分, 以转变中的中国政体为主线, 讨论中国现有政体的存续及其转型策略。最后总结全文, 并提出不同政体之间应该做到“存而不同”。

## 一

自 1940 年代起, 西方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存续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回答下述问题: 共产主义制度终将是昙花一现, 还是将长期存在下去? 为此, 学者们先后提出了趋同论、极权主义、新传统主义等不同的理论模式。大多数学者对 1980 年代之前的中国的研究并没有摆脱对苏东研究的窠臼, 很多分析和讨论甚至都是直接从苏东“搬运”到中国。1990 年代之后, 苏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相继转型, 中国成为最大的保留共产主义制度成分的国家, 并且在共

---

<sup>4</sup>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L. Shambaugh,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 C.; Armonk, N. Y.: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M. E. Sharpe, 1993, p. 14.

<sup>5</sup> 高敬文 (Jean-Pierre Cabestan) 认为: “欧洲专家似乎不太关注中国的体制、决策制定或政治经济等方面, 而这些却往往是美国和日本的研究主题。社会问题, 例如移民、医疗和教育政策、社会冲突和不稳定, 甚至是性别研究, 是欧洲和非欧洲中国研究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参见让-皮埃尔·卡贝斯唐: “欧洲的中国政治研究”,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 年第 2 期, 第 174 页。

<sup>6</sup> 如果按照何汉理的说法, 那么自 1950 年代末到 2009 年,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恰好走过了 50 年的历程。本文所梳理的文献也截止到 2009 年。

产主义制度崩溃浪潮面前屹立不倒。苏东剧变了，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包括中国政体存续问题在内的海外中国学开始成为西方新的学术热点，从而出现了崩溃论和延续论等预测模式。下文试概述之。

### （一）苏东剧变前的主要理论模式

#### 1、趋同论模式

“趋同”（Convergence）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是指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由于所处环境相同而在结构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和功能。所谓“趋同论”是指自 1940 年代兴起于西方学界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当时的苏联式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差别将逐渐消除；“两种制度”将发展为一种新制度；在具体含义上是指“两种制度”本质差异之外的体制成分将趋于相近。

最先提出“趋同论”的是熊彼特(Schumpeter, Joseph A.)和索罗金(Sorokin, Pitirim A.)。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由于投资机会日渐消失，企业家创新职能日益削弱，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自动出现”<sup>7</sup>。他主张资本主义制度逐步社会主义化。<sup>8</sup>索罗金在《俄国与美国》一书中，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科技、伦理、刑法、体育、艺术、宗教、家庭婚姻等 12 个方面比较了两种社会制度，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sup>9</sup>虽然当时他们尚未明确使用“趋同”这一术语，但相关论述已经包涵了趋同论的因素。1961 年，荷兰学者廷伯根（Tinbergen, Jan）第一次使用了“趋同”概念。<sup>10</sup>他认为，一种摆脱共产主义经济和自由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运动正在产生，每一种制度都吸收另一种制度的某些要素，从而形成一种在经济运行模式等主要方面类似的统一的混合社会模式。

---

<sup>7</sup>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167 页。

<sup>8</sup>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绛枫译，同上注，第 285 页。

<sup>9</sup> Pitirim Aleksandrovich Soroki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sup>nd</sup> ed., London: Stevens & Sons, 1950.

<sup>10</sup> Jan Tinbergen, “Do Communist and Free Economics Show a Converging Pattern?”, 12 *Soviet Studies* 333-341 (1961).

“趋同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衍生出了诸如“技术官僚趋同”（Technobureaucratic Convergence）、“意识形态终结论”、“多元主义趋同论”、“两种经济制度趋同论”等多种模式，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趋同论进行了阐发。例如，“技术官僚趋同论”认为：由于都离不开日益完善的行政管理技术和体制——实际上都是由技术官僚统治的，两种社会制度必然趋同。<sup>11</sup>技术官僚趋同说后来得到了政治学者梅尔（Meyer, A. G.）<sup>12</sup>和鲍瑞嘉（Baum, Richard）<sup>13</sup>的进一步发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是阿隆（Aron, Raymond）和贝尔（Bell, Daniel）。阿隆认为，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同一类型的两个品种，或者是同一社会类型（即进步工业社会）的两个形式<sup>14</sup>。贝尔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释。他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较早提出并全面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益趋同现象。他认为两大社会正面临着相似或相同的基本社会问题。因此，两者不仅有对抗的一面，还可能有相互借鉴的方面。<sup>15</sup>此后，许多学者及政治家纷纷著书立说支持这一理论。<sup>16</sup>

多元主义趋同论则认为，在共产主义统治过程中，随着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减少，会出现多元主义的群体竞争。当然，这种竞争是在政治控制框架内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种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趋势。<sup>17</sup>这一理论范式显然受到

---

<sup>11</sup>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Power: USA/USSR*,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4, pp. 10-11.

<sup>12</sup> Alfred G. Meyer, “Theories of Convergence”, in Chalmers A. Johnson,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up>13</sup> Richard Baum, “Diabolus Ex Machina: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 in Frederic J. Florn, *Techn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echnology under Socialism*, New York: Praeger, 1977.

<sup>14</sup> Raymond Aron, *18 Lectures o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7.

<sup>15</sup>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版。

<sup>16</sup> 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Zbigniew Brzezinski, *Game Plan: A Geo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Conduct of the U.S.—Soviet Contest*, Boston: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6; Richard M. Nixon,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oronto: Free Press; Maxwell Macmillan Canada, 199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16 *The National Interest* 3-19 (198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sup>17</sup> 参见 H. Gordon Skilling and Franklyn Griffiths, eds, *Interest Groups in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Jerry F. Hough, *The Soviet Union and Social*

了当时极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两种经济制度趋同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 K.）和罗斯托（Rostow W. W.）等人。加尔布雷思指出，长期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正在消失。他在讨论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都在增长时指出，发达资本主义与发达社会主义有趋同之势，两种经济制度在地球上可以共存。<sup>18</sup>

## 2、极权主义模式

在当代西方学界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模式影响最大。波普尔（Popper, K. R.）、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Carl）、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 Zbigniew）以及阿伦特（Arendt, Hannah）等人均专门解析过极权主义。波普尔在区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基础上，将极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图和黑格尔<sup>19</sup>。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从19世纪中东欧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入手，追溯反犹太主义思潮的极权主义因素及其根源，然后审视了欧洲从188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殖民帝国主义。她认为，历史上只有两种纯粹的极权主义统治，分别存在于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本书第二版的结论里，她认为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主义统治的先决条件。<sup>20</sup>

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专制体制均有所不同，它自成一体，纯属现代产物。<sup>21</sup>他们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概括了极权主义的六个特征<sup>22</sup>。他们认为，虽然极权主义的统治可能会因为战争或者体制内部因素而消失，但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消失了，还会有另一种形式取而代之。总之，极权主义的前景还不是很清晰<sup>23</sup>。阿伦特认为，正是出于人类自身的孤立与

---

*Science Theory*,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H. Gordon Skilling, “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Revisited”, 36 *World Politics* 1-27(1983).

<sup>18</sup> [美]约翰·K. 加尔布雷思、[苏]斯坦尼斯拉夫·缅希科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刘绪贻、刘末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156页。

<sup>19</sup> [英]K. R.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

<sup>20</sup>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sup>21</sup>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2<sup>nd</sup> e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3-5, 15-16.

<sup>22</sup> Id., p. 22.

<sup>23</sup> Id., p. 378.

孤独的可能性，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或者至少是其中的部分因素，有可能会长期存在。<sup>24</sup>

极权主义模式提出后，被普遍认为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形象的概括<sup>25</sup>，一些学者也用这一模式来分析和讨论中国。例如舍尔曼（Schurmann, Franz）在其著名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一书中，将意识形态看作是维系整个组织的粘合剂，而将组织（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士绅阶层的替代，它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sup>26</sup>

### 3、新传统主义模式

1980年代，以苏联为经验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家乔维特（Jowitt, Kenneth）和以中国为经验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魏昂德（Walder, Andrew）在批判趋同论和极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模式。魏昂德指出，“新传统主义”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也就是说，它强调的不是历史的连续性，而是表明现实中存在的那些与“传统”相同或相似的因素。<sup>27</sup>

1983年，乔维特批判了苏联研究中的趋同论观点，他认为苏联的政治经济是史无前例的全新形式，列宁主义政权的根本制度是一种新传统主义：一方面强调经验调查、讨论和个人能力的现代特征，另一方面却又强调组织的超凡魅力型权威。<sup>28</sup>乔维特认为，市场经济因素的成长、国家机构对技术专家的吸纳以及人文自由主义者的存在等方面，具有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具有现代性的一些发展倾向和做法，并不意味着这些倾向将继续成长并最终冲破新传统主义制度体系的限制。<sup>29</sup>在他看来，苏联政权有三种发展前景，一是西方式的政权，二是军队一党干部领导的政权，三是克格勃人员扮演政治角色的政权。他预言，西方式的政权不可能在苏联出现；而最有可能出现的则是克格勃人员干预政治的政权。<sup>30</sup>

---

<sup>24</sup>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同上注，第十三章。

<sup>25</sup>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sup>26</sup>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sup>27</sup> [美]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同上注，第11-12页。

<sup>28</sup> Ken Jowitt, "Soviet Neotraditionalism: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 35 *Soviet Studies* 275&278 (1983).

<sup>29</sup> Id., pp. 289-290.

<sup>30</sup> Id., pp. 290-293.

乔维特的研究影响了学者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研究，魏昂德对中国国有工厂中的“新传统主义”的研究就是典型之一。他认为，新传统主义的理论模式与趋同论和极权主义两种理论模式有着本质区别。它所描绘的那种特殊发展方式不是趋同性的。新传统主义模式与极权主义模式一样，着眼于研究共产党的那些独一无二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培育出了对社会的制度化的全面政治控制，并以其特殊的方式造就了社会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行为方式。但是，新传统主义模式在几个关键的方面不同于极权主义模式。首先，新传统主义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党对驯服的正面鼓励上。其次，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共产党为了动员社会确实提出了行为上非个人化的、以意识形态为准则的标准，同时还试图全面改造现存的社会结构；然而，这些非个人化的标准所带来的，却是个人以政治效忠和思想追随之为交换条件的特殊待遇，而且党的领导在实践中通常都需要发展一套无所不在的、由积极分子组成的固定关系网。再次，新传统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最后，新传统主义模式不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会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殊途同归。<sup>31</sup>

## （二）苏东剧变后对中国现有体制存续问题的讨论

1960年代，曾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中国不同于苏东地区的特殊方面，例如史华慈（Schwartz, Benjamin）对中国特色极权主义的阐述、<sup>32</sup>霍莱德（Hollader, Paul）关于中苏两国不同发展路径的研究<sup>33</sup>等。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方学者曾运用多元主义模式来分析中国政治<sup>34</sup>。当然，他们的理论前提并未完全脱离前述几种模式的“框框”。

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不再单以共产主义制度来看待中国，他们给中国的现有体制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诸如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新权威主义（Neo-Authoritarianism）、新列宁主义（Neo-Leninism）、<sup>35</sup>有中国特色的

<sup>31</sup> [美] 华尔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同上注，第6-9页。

<sup>32</sup> Benjamin Schwartz, "Totalitarian Consolid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l", 1 *The China Quarterly* 18-21 (1960).

<sup>33</sup> Paul Hollader, "Privacy: A Bastion Stormed", 12 *Problems of Communism* 1-9 (1963).

<sup>34</sup> Elizabeth J.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139 *The China Quarterly* 704 (1994).

<sup>35</sup> Minxin Pei,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Mar./Apr. *Foreign Policy* 32-40 (2006).

资本主义等。<sup>36</sup>本部分重点不是分析这些“标签”的合理性，而是关注于学者们对中国现有体制存续问题的讨论。综合来看，这些讨论可以划分为两种模式：崩溃论和延续论。下面分别对这两种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加以介绍。

### 1、崩溃论模式

苏东剧变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最低谷，中国虽然没有受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终结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sup>37</sup>1995年，美国学者戈德斯通（Goldstone, Jack）发文称“中国崩溃在即”。他认为中国面临着来自人口增长、农业与国有工业容纳就业能力的下降等压力，将很快爆发经济和政治冲突<sup>38</sup>。他预言中国将在十到十五年内发生致命的体制危机而崩溃。<sup>39</sup>何清涟在她早期书中批判了中国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所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sup>40</sup>并认为这些问题都源自于中国社会内部。之后，她发文指出中国现在面临着环境、社会道德沦丧、民众的暴力反抗等问题，这些问题让这个体制如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sup>41</sup>另一个鼓吹“中国即将崩溃”论调的是撰写《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的章家敦（Chang, Gordon G.）。他从民众的不满、低效的国有企业、网络的冲击、银行的呆坏账、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等方面历数了中国国内面临的种种困难和危机。他认为由于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现有体制所剩的时间极为有限了。<sup>42</sup>

另外两位颇有影响的“崩溃论”者是裴敏欣（Pei, Minxin）和谢淑丽（Shirk, Susan）。裴敏欣在他的《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一书中，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与东亚和印度做了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发展质量实质上并不高，中国已经陷入了转型陷阱。中国不会像东亚国家那样成功转型，其崛起会以失败告终。<sup>43</sup>之后，裴敏欣又提出了所谓新列宁主义政体的

---

<sup>36</sup>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37</sup> 裴宜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小乐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13日，第8版。

<sup>38</sup> Jack A. Goldstone,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99 *Foreign Policy* 35(1995).

<sup>39</sup> Id., p. 53.

<sup>40</sup> 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版。

<sup>41</sup> Qinglian He, “A Volcanic Stability”,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66-72(2003).

<sup>42</sup> 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侯思嘉，阎纪宇译，雅言文化2002年版。

<sup>43</sup>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



概念。他认为国家和大产业之间的近亲关系会毁掉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容易深受其害。<sup>44</sup>谢淑丽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出口贸易来支撑，当欧美经济衰退时，很可能造成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在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盛行、天灾频仍的时期诱发社会动乱。共产党权威正在弱化，权力不稳定的领导人依靠宣传民族主义来维系。如果上述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这个脆弱强权的崩溃。<sup>45</sup>

## 2、延续论

索尔尼克（Solnick, Steven L.）较早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考察为什么同样的分权化改革导致苏联解体却未引发中国分裂。在他看来，苏联的组织改革弱化了中央的权威，加快了整个制度的解体；而中国的改革却未触及权威问题。另外，中国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地方官员接纳了新的激励机制，转而强化了权威的正当性。<sup>46</sup>

2003年，美国《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出版专刊“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集中讨论中国的政体问题。黎安友（Nathan, Andrew）研究了中国政治运作的变化，提出中国出现了“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他认为，中共已经在四个方面实现了体制的制度化：一是接班政治的正常化；二是功绩制逐步取代派系考量，成为官员提拔升迁的主要标准；三是体制内机构和人员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四是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建立，以及正当性在公众心目中得到加强。他认为这四点虽然不能确保解决中共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至少能让现存体制不会快速崩溃。<sup>47</sup>季礼（Gilley, Bruce）不同意黎安友的观点，他认为中共的制度化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只是从混乱走向了和平。但是，季礼并不认为这一失败必然会导致政体的崩溃，因为中国现在有着强大的军队和警察等强制机构，同时公民社会则虚弱无力。<sup>48</sup>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44</sup> Pei, “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 pp. 36-37.

<sup>45</sup> 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46</sup> Steven L. Solnick, “The Breakdown of Hierarch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 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48 *World Politics* 209-238 (1996).

<sup>47</sup> Andrew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6-17 (2003).

<sup>48</sup> Bruce Gilley,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18-26 (2003).

狄忠蒲 (Dickson, Bruce) 在讨论中共的适应性 (Adaptation) 时指出, 中共对改革的适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新党员的招募, 二是如何与党外团体建立联系。中共采取的策略是吸纳非异见者, 同时排斥和孤立异见者; 容忍个体的、独立的抗争而不容忍有组织的抗争。他还指出, 中共通过对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团体的控制, 使这些团体不再追求自主性, 而是愿意嵌入到体制内。并且, 中共现在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些都使得中国的现有体制免于发生转变。但狄忠蒲依旧认为, 中国现有政体终将无法承受不断增大的社会压力。<sup>49</sup>

## 二

学者们在共产主义制度存续问题上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很多模式或预测。但 19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以及中国那场政治风波的发生, 仍然超出了学术界各种理论模式的预测范畴。西方民众甚至开始怀疑和指责众多研究的价值<sup>50</sup>。下文首先概括上述五种理论模式; 然后从前提假设、理论主张及论证两方面讨论这些理论模式的局限性; 之后, 还将讨论学界对苏东地区制度转型的一系列反思。

### (一) 五种理论模式简评

#### 1、对五种模式的简要概括

表 1 从提出时间、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及预测三个方面, 对上述五种模式做了一个小结:

表 1: 五种理论模式对照表

理论模式	提出时间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及预测
趋同论	1960 年代	熊彼特、廷伯根等	存在一个共同的社会模版; 两种社会制度长期来看将会同构
极权主义	1960 年代	弗里德里希、布热津斯基等	全然现代的形式, 国家对社会完全控制; 可能会长期存在
新传统主义	1980 年代	乔维特、魏昂德	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体制; 可能出

<sup>49</sup> Bruce J. Dickson, "Threats to Party Supremacy",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5(2003).

<sup>50</sup>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p. 33.

		等	现克格勃人干预政治的政权
崩溃论	1990 年代	戈德斯通、谢淑 丽等	危机重重；将很快崩溃
延续论	2000 年代	黎安友、狄忠蒲 等	中共有效地调整策略，并存在某些 客观因素；有可能继续存在

总体而言，趋同论模式与极权主义模式代表了对共产主义制度分析结论的两个极端。趋同论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共通性；极权主义则重在分析共产主义的独特性。趋同论认为共产主义制度只是“暂时性”的；极权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是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持续存在。新传统主义模式则介于趋同论和极权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它在批判趋同论而肯定了共产主义制度独特性的同时，也批判了极权主义的观点，从而指出了共产主义制度通过与传统因素的结合而持续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存在与共产主义的原初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最后，如果说持崩溃论观点的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为何会崩溃以及何时崩溃；那么持延续论观点的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它为何还未崩溃。

## 2、趋同论、极权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看它们的前提假设。趋同论假设存在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发展“模版”，不同的制度只是通往这个模版的不同道路而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产主义最终会与资本主义一样殊途同归。两种制度只是现代化这一更加广泛的过程中的一部分。<sup>51</sup>但该理论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一种“超然的力量”可以使得两种制度按照此“模版”实现趋同。极权主义则先验地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善”的，从而认为与之不同的制度设计必然“不正常”，甚至就是“恶”的，因而需要改造。极权主义假设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存在边界。但它只描述了该政治体制内国家干涉的范围，却无助于我们认识国家干涉和控制的有效程度<sup>52</sup>。另外，即使这种全面控制是真实存在的，也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合理性，尤其是当某个共同体面对全面的民族危机时，全能型政

<sup>51</sup> John H. Kautsky,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Wiley, 1972.

<sup>52</sup> 此处借用了王绍光点评“新权威主义”概念时的说法，参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1991年第4期，第3页。

府可能是应对这类全面危机时的不得已选择。<sup>53</sup>新传统主义则既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它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相互借鉴的因素。但这一模式过分强调工厂中行动结构的一致性和单位制中精英的作用，而忽视了普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方式、普通群众的利益与行动对“领导”和“精英”的限制和软性约束。这表明他们的理论仍带有其所批判的极权主义模式的残余影响。

其次看它们的理论主张和论证。荷兰学者埃尔曼（Ellman, Michael）认为趋同论有四个重大的消极面。第一，这一理论已经被很多观察（Observations）证明是错误的。第二，这一理论低估了两种制度之间重大而长远的分歧，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市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产权收入、失业、就业保障的缺乏、持续性的通胀、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革新性产品的迅速发明和生产。第三，趋同论忽视了趋异的程度。第四，趋同论无法解释两种制度在地理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迁。<sup>54</sup>趋同论之所以被大张旗鼓地宣传和传播，从以下两位美国政治理论家的话中大概可以体会一二：布热津斯基与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曾毫不掩饰地讲，“所谓趋同论的主要之点实质上不在于它倡导什么趋同，而在于它能把敌对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吸收掉，融化掉”。<sup>55</sup>这真可谓一语中的。

极权主义模式也遭到了诸多的批判。詹隼（Johnson, Chalmers）等学者批判了极权主义对体制僵化性的过度强调。<sup>56</sup>实际上，自1960年代末以来，随着共产主义国家各种改革方案的实施，共产主义社会内部开始发生诸多变化。人们对极权主义模式的质疑更加普遍。政治多元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等分析模式逐渐取代了极权主义模式。<sup>57</sup>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即使是在所谓“极权主义”控制最为盛行的1930、40年代的苏联和1950年代的中国，也存在着很多与该理论模式的分析相悖的事实。例如，许慧文（Shue, Vivienne）对中国集体化经济时期农村社会的研究表明，虽然国家将其权力中心扩大、下沉到了乡村社会，

---

<sup>53</sup>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再解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6页。

<sup>54</sup> Michael Ellman, “Against Convergence”, 4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01(1980).

<sup>55</sup> 转引自辛向阳：《“趋同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sup>56</sup> Chalmers A.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3, 117, 135-136, 314, 347-351.

<sup>57</sup> Victor Nee, David Stark, and Mark Selden eds,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但“乡村社会的分散和孤立状态，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甚至加强了”。她将中国农村社会的这种结构称为“蜂窝状”结构（Honeycomb Structure）。在这种“蜂窝状”乡村社会结构中，农村干部开始作为村庄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敢于同乡镇领导讨价还价，并且漠视、甚至阻止上级的命令。这种“农村地方主义模式”阻碍了乡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步伐。<sup>58</sup>与之类似，戴慕珍（Oi, Jean）对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队组织的研究发现，在毛泽东时代，与国家干部不同，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的薪资并不是由国家来支付。在农村地区，这些生产队领导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代表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农民的利益。<sup>59</sup>她认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以生产小队长（即后来的村民小组长）为媒介的。<sup>60</sup>

对新传统主义而言，它一个明显的理论局限性在于其研究对象。不论是乔维特还是魏昂德的研究，都是针对共产主义社会中公有制单位的研究总结出来的。虽然魏昂德试图将他对工厂的研究推广到中国全部社会关系中，<sup>61</sup>但该理论仅仅是基于对中国 2.5%的人口分析。这就使得它在描述中国政治社会全貌时显得不够可靠了。<sup>62</sup>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多数共产主义国家各类改革方案的实施，尤其是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开始之后，单位人（即单位内的各个成员）与单位之间的这种“服从—保护”和“依附—控制”关系结构逐步被现在的“权利—义务”型契约结构所代替。<sup>63</sup>新传统主义所能提供的理论解释效度又进一步大打折扣。

### 3、崩溃论和延续论的局限性

这两种论调的前提假设是基于威权与民主的二元对立，也即它们认为不同于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政体是不可能维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因而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但是，施沃尔斯基（Przeworski, Adam）则认为，由于无法观测到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案例，我们不能确定哪一种制度更能促进经济发展。<sup>64</sup>

---

<sup>58</sup>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53.

<sup>59</sup> Jean Chun Oi,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60-89.

<sup>60</sup> Id., pp. 63-7.

<sup>61</sup> [美] 华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同前注，第 271-72 页。

<sup>62</sup> Elizabeth J. Perry, “Review: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41 *World Politics* 584 (1989).

<sup>63</sup>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3 页。

<sup>64</sup> Adam Przeworski, “Institutions Matter?”, 39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527-540 (2004).

对中国崩溃论而言，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和持续发展。对那些甚至预言了中国崩溃准确时间的论调，时间本身已经让这些观点不攻自破。戈德斯通的论证基本上是他早先分析前现代化国家革命与反叛<sup>65</sup>的延续。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去世并没有如戈德斯通预言的那样造成终结性危机。章家敦的分析，不论是在案例选择方面，还是在材料的分析方面，都夹杂着太多的个人价值观偏见。例如，他在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问题时，选用的是四川金顶股份有限公司“政企难分”和鞍山钢铁公司经营困境的负面事例。<sup>66</sup>事实上，中国的国企改制的确有部分不成功的，但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仅以不成功的案例加以分析是有失偏颇的。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自1990年代末期之后，国有企业的效益正逐步得到改善。<sup>67</sup>谢淑丽的分析则夸大了中国政体的脆弱性。实际上，中国开始在各方面（包括强制力、经济、知识等）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中国领导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他们会主动构建大众的期望并与大众保持互动。<sup>68</sup>其实，“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有些类似，它们的时常出现既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充分了解，加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也是一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和新闻炒作的需要。

对持延续论的学者而言，他们都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忽视了中国近些年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没有能够把中国政体面对经济社会变迁时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考虑进来。正如王绍光通过对中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分析之后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

---

<sup>65</sup> 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sup>66</sup> 章家敦：《中国即将崩溃》，同前注，第75-80页。

<sup>67</sup> Weiye, Li, and Louis Putterman, “Reforming China’s SOEs: An Overview”, 50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353 - 380 (2008).

<sup>68</sup> David Shambaugh, “Book Review”, 192 *The China Quarterly* 1018-1019 (2007).

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吃的时候了。<sup>69</sup>

## （二）对苏东剧变的原因及转型情况的反思

学者们对苏东剧变背后原因的讨论，更多的是出现在剧变之后。几乎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苏东地区多数国家发生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几乎照搬照抄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转型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 1、对苏东剧变原因的讨论

在稍早的研究中，有学者沿用极权主义模式，认为是由于原先苏东地区极权主义体制缺乏应变能力和适应性，在改革之后，逐渐出了问题而崩溃。<sup>70</sup>但更多学者试图从其它角度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一问题，美国《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 期刊在 1994 年 4 月出版专辑，以分析苏东剧变的原因及其理论意义。

魏昂德在那一期的文章中初步总结了学界对苏东剧变的认识。<sup>71</sup>他认为，先前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有很多令学者们尴尬的地方。因为很多最终导致政体变迁的宏观社会趋势其实并不难以发现，例如经济停滞和消费不足、官方意识形态公信度的下降、广为弥漫的不满情绪、官僚腐败和公职工具的削弱、社会和知识分子自主性的提高和自我组织空间的逐步扩大等。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最近我们才将上述趋势用以解释这次剧烈的政治变迁；而之前长达半个世纪里，人们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政体是非常稳定的。<sup>72</sup>由此，魏昂德认为“在解释共产主义政体为何衰退或者崩溃前，必须要解释它为何能存在如此长时间”。<sup>73</sup>他以政治秩序理论作为解释变迁的出发点。他认为，当政治体制变迁时，原有的制度安排一定是遭到了侵蚀；但侵蚀的途径还未得到充分揭示。只有我们明确了那些保持原有体制稳定的机制，才能找到解释它崩溃的原因。以前认为苏东解体的原因是“社会”超越了“国家”，但这一解释并没有说明是如何超越的。魏昂德认为，

---

<sup>69</sup>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第 99 页。

<sup>70</sup> 参见 Jean Fitzpatrick, “After Communism, What?”, 41 *Problems of Communism* 7-10(1992); Martin Malia, “From under the Rubble, What?”, 41 *Problems of Communism* 89-106(1992).

<sup>71</sup> Andrew Walder, “The Decline of Communist Power: Elements of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up>72</sup> Id., p. 297.

<sup>73</sup> Id., p. 298.

造成苏东剧变的原因“不是所谓的经济不景气、不满情绪的弥漫、或者腐败丛生，而是那些原本维持着既有政治秩序的制度安排不再起作用”。<sup>74</sup>

索尔尼克的研究所要回答问题是：为什么并不很激进的分权化改革导致了苏联体制的崩溃，而同时在中国进行的、更加深入的分权化却并未对其政治和行政等级制度造成影响呢？他反驳了不少学者所认为的，即中共改革之所以避免了政体的崩溃，主要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策略，同时推迟了政治改革的进程，从而使得中央政治权威有足够的力量来掌控经济改革的进程。<sup>75</sup>索尔尼克的观点是，中苏两国改革结果的不同，与两国改革过程中是否保持了制度的稳定性有着密切关系。在苏联方面，改革很快削弱了连接苏联内部等级制度的权威，并加速了组织的解体，从而使得渐进式改革路径无法实施。而在中国的改革却并未触及到这一权威。<sup>76</sup>借助“委托—代理”理论，索尔尼克指出，苏联在改革前形成了非常集中化的中央集权制度；而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放权给地方，但却不能对地方保持有效的监控，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对全国局势失去控制。反观中国，地方分权行为古已有之，且共产主义中国从未能建立起像苏联那样成熟的中央集权体制；所以当改革放权的时候，地方政府不仅从中央获得权力和利益分成，也可以从地方经济发展中获利。中央还通过撤销计划经济管理部门，用税收分成和协商等方式来监控地方，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中央的权威。由此，他得出如下结论，改革过程中等级权威的侵蚀并非不能避免；如果能激励地方的代理人接受等级权威，那么组织结构可能会保持稳定。<sup>77</sup>类似地，倪志伟（Nee, Victor）与连鹏（Lian, Peng）的研究认为，苏联的改革进程中，国家的监督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从而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sup>78</sup>而戴慕珍对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的研究，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索尔尼克的观点。<sup>79</sup>

---

<sup>74</sup> Id., pp. 298-299.

<sup>75</sup> 参见 Alan Gelb, Gary Jefferson, and Jnderjit Singh, “Can Communist Economies Transform Gradually: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8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87-133 (1993).

<sup>76</sup> Steven L. Solnick, “The Breakdown of Hierarchi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 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sup>77</sup> Id., pp. 222-236.

<sup>78</sup> Victor Nee, and Peng Lian,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A Dynamic Model of Declin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in State Socialism”, 23 *Theory and Society* 253-296(1994).

<sup>79</sup> Jean Chu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2、对苏东国家制度转型的反思

冷战期间及其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前述极权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统治模式记忆犹新，在思考下一步改革方向时，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共产党统治下“全能的政府”。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只有取消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规模私有化，同时限制国家的权力，才能保障个人的自由。加之当时所谓“华盛顿共识”挟在拉美挽救金融危机的成功而甚嚣尘上。不少刚刚脱离共产主义体制的苏东国家，在国内国际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普遍采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 Jeffrey）开创的“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为模板的综合型改革。这一改革方案的主要特点是放开物价、收紧财政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把注意力集中于打碎政府的控制结构和降低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的程度。

但是，萨克斯的这一模式使得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了长期的低迷，造成了灾难性的衰退。科耐（Kornai, János）将其称之为“转型性衰退”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即从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衰退。<sup>80</sup>由于经济低迷，企业效益低下甚至大量破产倒闭，各个国家纷纷爆发工人罢工浪潮。根据世界银行的抽样调查，在1991年12月，有1/4的俄罗斯人不认同普通群众受益于实施私有化制度的说法。而到了1995年3月，则有超过2/3的俄罗斯人不同意上述说法。<sup>81</sup>由于私有化造成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满，俄罗斯和东欧的民主制度难以得到巩固。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关注转型给经济带来的混乱和给社会带来的巨大代价。学者们也开始反思这一转型的教训。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oseph）指出，“震荡疗法”最初是针对1980年代拉美国家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案，将它应用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不一定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因为不同的国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sup>82</sup>具体说来，当时的拉美国家市场机制已经建立，但出现了市场关系扭曲的问题。“震荡疗法”

---

<sup>80</sup> János Kornai, “Transformational Recession: A General Phenomenon Examined through the Example of Hungary’s Development”, 46 *Economie Appliquée* 181-227(1993).

<sup>81</sup> World Bank, “From Plan to Market”,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New York: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2; 转引自 Zhiyuan Cui, “Privat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Regimes: An Analysis and an Alternative”, 5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83-684(1997).

<sup>82</sup> Joseph Stiglitz,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1998).

通过价格自由化、紧缩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等手段来稳定宏观经济；并以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指标来表征市场体系被矫正的效果。这一方案的实施的确使得拉美国家的宏观经济趋于稳定。但是，苏东国家经过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基本不存在。在这种市场机制环境缺失的前提下引进震荡疗法并没有“对症下药”。科勒德克（Kolodko, Grzegorz W.）指责“华盛顿共识”必然导致“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Vacuum）。他认为，良好的财政状况、低通货膨胀、稳定的汇率以及平稳的金融市场，这些只是经济政策的手段；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标准的提高才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但是在实施这些政策手段的几年后，转型国家并没有获得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标准的提高。因为，私有化和自由化等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假定（而不是一定）能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竞争力的手段上，而没有更多关注它们实施的结果；这种偏见导致了政策的扭曲，使政策工具变成了目标本身。<sup>83</sup>

而在政治学者看来，俄罗斯和东欧私有化过程中实行的主要办法所遇到的这一严重困境可以概括为：尽管私有化一开始促进了向民主制的过渡，但很快就对民主政权的巩固构成了威胁。<sup>84</sup>这一过渡与巩固之间的两难可能是施沃尔斯基如下描述的更大的两难的一部分：为建立民主制，反对专制统治的力量必需团结对外；但要在民主制下获胜，它们则必需互相竞争。因此，建立民主制的斗争总是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为民主制的建立与专制统治斗争；同时为在民主体制下争得最好的位置而同其盟友斗争<sup>85</sup>。施沃尔斯基还通过对制度内生性（Endogenicity）的讨论，提醒人们：

应该怀疑我们之前对制度力量的迷信，并且需要谨慎地行动。制度改革方案必须以实际所面对的环境为出发点，而不能照搬在其它地方成功的制

---

<sup>83</sup> Grzegorz W. Kolodko, “Ten Years of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The Lessons for Policy Reforms” *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095 (1999), p. 13.

<sup>84</sup> Zhiyuan Cui, “Privat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Regimes: An Analysis and an Alternative”, p. 683.

<sup>85</sup>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转引自 Zhiyuan Cui, “Privatization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tic Regimes: An Analysis and an Alternative”, p. 683.

度。正如巴西前任部长路易斯·卡洛斯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曾经指出的那样, “制度至多只能用来借鉴, 但决不可照搬”。<sup>86</sup>

那么, 如何才能在转型国家建立起持久而稳定的民主体制呢? 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较早反思这一问题的是经济学家科耐。1990年, 他推出了名为《通往自由经济之路》的书,<sup>87</sup>以讨论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种种变革措施。在书的最后一章, 他谈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按照科耐的说法,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实现向自由经济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 当时的科耐并未分析如何才能造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以及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有力的政府。<sup>88</sup>顺着科耐的思路, 王绍光提出要将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分。他认为国家能力问题在比较经济制度和比较政治制度研究中, 不是被完全忽略了, 就是被当作了特定政权形式的固有属性。实际上, 政权形式属于同一类型或者相似的国家, 其国家能力可能大不相同。进而, 他界定了国家能力的概念——它是指国家将自身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sup>89</sup>王绍光认为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权, 其途径不能是弱化国家能力。<sup>90</sup>

林茨 (Linz, Juan) 和斯蒂潘 (Stepan, Alfred) 在对比了南欧、南美和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化国家转型过程之后发现, 那些一开始就将弱化政府权力和大规模私有化作为首要改革目标的国家, 如多数东欧国家, 其民主化进程进展缓慢; 相反那些似乎并未将缩减政府规模作为首要目标的国家, 其民主化进程反而取得很大进展。<sup>91</sup>他们认为, 如果一种民主制度被认为不能提供诸如外部安全、国内秩序、司法公正、基础教育、预防传染病、对市场机制造成的伤害作出补偿和对显著的不平等现象作出调整等一些列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 则其糟糕的政绩就会越来越引起人民的不满, 并最终导致政府的权力危机, 甚至还可能造

---

<sup>86</sup> Adam Przeworski, “Institutions Matter?”, p. 540.

<sup>87</sup> János Kornai,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Shifting from a Socialist System: The Example of Hungary*, New York; London: Norton, 1990.

<sup>88</sup> 王绍光: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 第1页。

<sup>89</sup> 同上注, 第2-3页。

<sup>90</sup> 同上注, 第36页。

<sup>91</sup> Juan J. Linz, and Alfred C.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成民主制度的解体。<sup>92</sup>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民主。林茨和斯蒂潘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霍尔姆斯（Holmes, Stephen）和王绍光等人的支持。<sup>93</sup>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才算是有效的政府呢？王绍光等人认为，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和业务量的不断增长，所谓政府的有效性显然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现象。任何一个单一的指标都似乎无法涵盖政府有效性的所有方面。因此，需要列明某些关键的政府职能，并通过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来测定各种不同政府的有效性。他认为，有效的政府需要能够履行如下职能：（1）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2）提取资源，（3）塑造民族统一性和动员群众，（4）调控社会和经济，（5）维持政府机构的内部凝聚力，（6）重新分配资源。<sup>94</sup>当然，还有一点要指出，那就是在民主过渡期间，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必须改变。<sup>95</sup>

### 三

苏东国家“转型性衰退”表明了盲目照搬其它地方成功的制度，不一定就能得到预期的转型效果。因为正如施沃尔斯基所讨论的，制度具有内生性。因此，每一种政治制度都须以其所处的环境为基础来构建。由于国与国之间环境千差万别，自然地，其各自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中国现在的政体与其他国家的政体有所不同；中国将来的政体几乎肯定也会与其他国家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不需要改变了。如何概括中国现有政体的特征并非易事，这里我们姑且使用“转型政体”这一概念。它的好处是使我们能更加关注于中国政体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诸多变化，并思考其未来转型的方向。

#### （一）中国现有政体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

<sup>92</sup> Id., pp. 2-13.

<sup>93</sup> Stephen Holmes, “What Russia Teaches Us Now: How Weak States Threaten Freedom”, 8*The American Prospect* 30-39(1997); 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sup>94</sup> 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同上注，第92页。

<sup>95</sup> 王绍光：“有效的政府与民主”，同上注，第100页。

前述对中国政体存续问题的讨论，几乎都忽视了中国近些年来在政治体制上发生的诸多变化。以下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基本制度建设、政体应对经济社会变迁时运作机制的调整这三个方面来分别概述这些变化。

### 1、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首先看国家层面：一个监管型的国家正在中国逐步形成。杨大利(Yang, Dali)认为，中国近年来的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经济自由化的继续、政府规模的缩小和干预的减少，以及财政、社会安全和信息控制的重新加强，都使得国家工具能更加有效地运作，并适应了经济社会变迁所提出的要求。虽然短期内政治多元化仍然难以实现，但一个既有限、又有效的新型政府成为中国政府现代化的目标。<sup>96</sup>王绍光通过对煤矿生产安全监管政策的研究也认为，一个建立在法制、高效、独立基础上的监管型政府正在取代旧式的全能式政府，成为新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具体特征包括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生产、监管者本身也要受到监督和限制、建立一系列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手段的现代化等。<sup>97</sup>其他一些学者，如吕晓波(Lv, Xiaobo)、皮尔森(Pearson, Margaret M.)、韩博天(Heilmann, Sebastian)等人通过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网络型产业以及金融产业监管的研究，也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促使中国正在超越发展型国家而向监管型国家的治理模式转变。<sup>98</sup>另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认为，如果从建立集权和独立的监管机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一些改革与OECD国家所倡导的监管型政府改革十分类似。<sup>99</sup>

---

<sup>96</sup> Dali L.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97</sup> Shaoguang Wang: “Regulating Death at Coalmines: Changing Mode of Governance in China”, 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30(2006).

<sup>98</sup> Xiaobo Lu, “Beyond Developmental State: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the Rise of Regulatory State in China”, in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 S. A. 2003; Margaret M. Pearson, “Mapping the Rise of China’s Regulatory State: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Network and Insurance Industries”, in *The Annua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New York, U. S. A., 2003; Sebastian Heilmann, “Regulatory Innovation by Leninist Means: Communist Party Supervision in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181 *The China Quarterly* 1-21(2005).

<sup>99</sup>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in the Global Economy: Governance in China*, Paris: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5.

再看社会层面：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成长中，<sup>100</sup>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团革命的一部分。<sup>101</sup>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逐步缩小了干预社会的范围，这为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挥作用打开了空间；社会组织的活动可以使一些利益诉求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社会组织也开始承担部分公共服务职能。<sup>102</sup>社会团体（尤其是环境保护类）的数量和规模逐步获得了发展。<sup>103</sup>需要特别指出的，中国的社团组织通过参与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工作，增强了组织能力，提高了公众关注度，也增加了与地方政府的互动。<sup>104</sup>

## 2、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展

第一，中国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步建立在了精巧的制度设计上，从而可能使两者之间关系更加持久，并减少两者间的冲突。<sup>105</sup>在利益表达机制上，信访制度等的建立，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有了制度化的表达渠道。<sup>106</sup>工会等既有的制度遗产，也为工人表达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性。<sup>107</sup>第二，国家能力逐步提升。例如，作为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的认证能力<sup>108</sup>、作为其它能力的资源保障的汲取能力、<sup>109</sup>作为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强制能力等。<sup>110</sup>第三，基层民

---

<sup>100</sup>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Hsiao-yüan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101</sup> 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sup>102</sup> Tony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161 *The China Quarterly* 124-141 (2000).

<sup>103</sup> 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32 *Development and Change* 893-921 (2001).

<sup>104</sup> Jessica C. Teets, “Post-Earthquak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198 *The China Quarterly* 330-347 (2009).

<sup>105</sup> Minxin Pei, “Citizens Vs Mandarins: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 China”, 152 *The China Quarterly* 832-862 (1997).

<sup>106</sup> Kevin J. O’ Brien, and Li Lianjiang, “The Politics of Lodging Complaints in Rural China”, 143 *The China Quarterly* 756-783 (1995); Kevin J. O’ Brien, “Rightful Resistance” 49 *World Politics* 31-55 (1996).

<sup>107</sup> Feng Chen,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176 *The China Quarterly* 1006-1028 (2003).

<sup>108</sup> 欧树军：《国家认证能力研究》（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2009年。

<sup>109</sup> 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公共政策格局的历史性转变”，载《中国公共政策评论》2007年第1卷。

<sup>110</sup> 樊鹏、汪卫华、王绍光：“中国国家强制能力建设的轨迹与逻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主制度建设和实践也在逐步开展。<sup>111</sup>这一改革鼓励基层进行民主化选举，从而重新焕发了政党在基层的权威。它受到基层民众的欢迎，毕竟对普通的中国民众而言，惩治身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要比全国性改革来得更加迫切。<sup>112</sup>

### 3、政体应对经济社会变迁时运作机制的调整

除了上述正式制度的建设之外，我们还需要分析更多实际政治运作机制（Mechanism）的变化。<sup>113</sup>欧博文（O'Brien, Kevin）对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改革的研究表明，人大如同一扇可以窥视中国党与社会、党与国家的窗口。在邓小平时代明确拒绝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框架后，人大开始关注于通过规范政策制定过程而使人大的运作更加合理化。其改革主要包括：一是扩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及其工作范围；二是提高人大的专业化、程序化程度以及全职人大代表的数量；三是改善人大的内部组织。<sup>114</sup>夏明（Xia, Ming）通过研究地方人大改革后也认为，地方人大通过有效运用改革策略，不仅扩大了自己的权力运作范围，而且影响了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如地方政府等。<sup>115</sup>沈大伟在谈到中共的适应性时指出，中共通过吸纳党外人士、加大反腐败力度、推行基层民主选举等措施，增强了自身的执政能力。<sup>116</sup>他和彭轲（Pieke, Frank N.）等人通过对中共党校系统的研究认为，党校承担了培养政治精英的角色，并且在中共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对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适应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sup>117</sup>

---

<sup>111</sup>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6-48 (1996); 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s", 61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115-1139 (1999).

<sup>112</sup> Elizabeth J. Perry, and Merle Goldman,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

<sup>113</sup> 梯利（Tilly, Charles）非常重视机制研究在政治科学中的地位。参见 Charles Tilly,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 4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41 (2001).

<sup>114</sup> Kevin J O'Brien, *Reform without Liber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6-7.

<sup>115</sup> Ming Xia, "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 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5-214 (2000).

<sup>116</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up>117</sup>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196 *The China Quarterly* 827-44 (2009); 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3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1-38 (2007).

王绍光在分析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时，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他认为，在今日中国，六种模式依然同时并存。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相比，强人政治的色彩已近销声匿迹。在议程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民间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sup>118</sup>韩博天在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时，分析了政策（主要是经济领域）制定过程中独特的试验机制所发挥的作用。<sup>119</sup>王绍光则进一步通过考察中国农村医疗融资体制过去六十年的演变历史，发现中国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能够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和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他认为“中国模式”逐渐成型，其活力来源于从不相信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sup>120</sup>他提出：

不少人以为划分政治体制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存在竞争性的选举。……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也可以按是否具有学习/适应能力来划分。而学习模式的优劣、适应能力的强弱与有没有竞争性选举毫无关系。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体制属于高适应性体制，而许多选战喧嚣的体制却只能归入低适应性体制。从动态的角度看，适应能力也许比什么都重要。<sup>121</sup>

借用裴宜理（Perry, Elizabeth）的说法<sup>122</sup>总结以上讨论。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主义政体在处理一次次事件的过程中，其自身不断得到完善。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够巧妙地将不同的经济社会挑战转化为权力的再生资源。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情况，我们不能仅从体制转型和民主化角度去把握中国政体的变化，而应该从其政治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来研究。因为如果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一成不变，那么它所应对的很多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将之打垮。

## （二）未来转型路径的思考

<sup>118</sup>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sup>119</sup> Sebastian Heilman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s Economic Rise”, 43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6 (2008).

<sup>120</sup>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sup>121</sup> 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同上注，第133页。

<sup>122</sup> 裴宜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同前注。



学者们对未来中国转型路径的讨论，主要体现在是要建设一个“民主国家”，还是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这两个方案上。

### 1、建设一个民主国家

在萧功秦看来，中国现在的执政者已经以技术专家为主导。他们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所以决策会更加理性化。而新兴的中坚力量既不希望重返社会主义，也不希望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政治变迁中去。执政者会迫于民众的压力而采取迈向民主的改革，但是这样的改革是以一种非常实用化的路径来推动的，而不是做出民主化的理想承诺。这一路径的标准大致有四点：有用性、安全可控性、灵活性、正当性——总之是不会挑战现有体制，尽管与大众的要求不完全相同。<sup>123</sup>

王绍光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构想<sup>124</sup>。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加强国家机器，而不是损坏它；如果损坏国家机器，我们可能既得不到民主，也得不到国家。他还分析了中国在国家能力方面的危机，并主张加强国家能力建设，尤其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配能力。<sup>125</sup>进而，王绍光、胡鞍钢与周建明等人呼吁要转变改革战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为以制度建设为中心。他们认为，第一代改革思路是经济建设，第二代改革的思路则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具体来说，一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民主化；基本制度建设要先行一步，因为它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法制和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否则民主化就可能演化为泛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二是国家制度建设应当包括民主政治的成分，而且其最终目的也是要在在中国建立稳固的、基于法治的民主政治体制。三是有序地扩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是建设民主国家制度的必经之路。为此，国家要具备和增强以下八项基本职能与相应的能力：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守护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

---

<sup>123</sup> Gongqin Xiao, “The Rise of the Technocrats”,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60-65(2003).

<sup>124</sup> 前文已述，参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一文。

<sup>125</sup>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Shaoguang Wang, “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 14 *Journal of Democracy* 36-42(2003).

将民众的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sup>126</sup>

俞可平也提出了渐进民主（增量民主）理论。在谈到中国将来政治转型的路径时，他主张仿效渐进式经济改革，在政治领域进行增量式改革，也即增量民主的概念。他认为这一概念有五个涵义：首先是正在或将要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需要有足够的存量。其次是这种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和对存量的增加。其三，这种改革与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不是突变。其四，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最后，根据增量民主或增量政治改革的思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当成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sup>127</sup>

## 2、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潘维在 1999 年明确地提出将建设一个咨询型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将来的政治改革方案。<sup>128</sup>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两者总有先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无法兼容。民主化并不能解决吏治、行政（执法）和司法三大问题，反而有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相反，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sup>129</sup>

潘维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006 年，赵穗生 (Zhao, Suisheng) 等人曾组织以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之后，他们还将会议论文编辑成书，专门讨论了法治与民主两种改革方案在中国的前景问题。<sup>130</sup>

---

<sup>126</sup> 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载《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2 期，第 95 页。

<sup>127</sup> 闫健编：《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62 页。

<sup>128</sup> 潘维：“法治与中国政治的未来”，载《战略与管理》1995 年第 5 期。

<sup>129</sup> 潘维：“法治与中国政治的未来”，同上注，第 30 页。

<sup>130</sup> Suisheng Zhao, *Deba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Rule of Law vs.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 Y. : M. E. Sharpe, 2006.

## 结语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学者检验和修正各种政治理论模型的实验场。<sup>131</sup>但是，他们对中国现有政体存续的讨论和预测并不令人信服。究其原因，除了前述在研究的前提假设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意识形态的影响恐怕也难以忽略。既然每个国家的国情各有不同，由此而内生的各种制度也就不同；而且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不同类型的政体之间应该可以“存而不同”。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以一部分国家为模板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这些国家自己所标榜的政治制度还是“被阉割”和“经过无害化处理”的。<sup>132</sup>

我们应摘除基于西方标准的“有色眼镜”，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将其现有体制视为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存在。这一政体是具有活力的，因为它本身是富有灵活性和弹性的，也是在不断转变的。这有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制度方面的“自卑感”。

当下，建设一个民主国家似乎成为中国政体转型的主要方向，但我们也不能忽略讨论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实现转型。这期间，绝不应该盲目地牺牲政府的有效性，而应该让政府能够更好地履行其在国防安全、公共秩序、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持久而有序的民主化国家。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回避中国现有政体存在的矛盾和不足，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中，以下问题可能尤为重要：中国现有政体还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变化的？这一政体在不同方面的运作机制如何？有没有发生过变化？这些运作机制在比较政治视野中有何优势和不足？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政体及其运作机制的变化能为我们将来的转型——无论是民主化，还是法治化——提供哪些经验和教训？

---

<sup>131</sup>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p. 32.

<sup>132</sup>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242 页。